



【人生随想】

# 2017年： 挂历哪儿去了

□林少华

2017年1月1日，元旦。一个星期来我始终在悄悄等一样东西：挂历。没有等到。不可能到了。而2017年的挂历没到，感觉似乎2017年本身没到。因为没有证据。太阳是昨天的太阳，天空是昨天的天空，甚至窗外槐树梢的喜鹊都像是昨天的那只。昨天是去年最后一天——去年最后一天和今年最初一天的区别在哪里呢？今年去年有何不同呢？倘有挂历，立见分晓。淡淡的失望如傍晚时分淡淡的雾霭笼上心头。

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三四十年间每年都有挂历如期而至。近几年虽说少了，但两三本总还是有的。一般是出版社的，本地的、京沪的。我喜欢出版社的挂历。毕竟不像银行挂历那样诉求直截了当：恭喜发财。发财谁都喜欢，我也喜欢。但把手托金元宝或“孔方兄”的财神老爷请来书房，就好像酒桌上突然和某位大款坐在了一起，不知是靠近些好，还是离开些好。书房还是出版社挂历合适。书是出版社出的，没有出版社就没有书，就没有书房，甚至没有我这个读书人、教书人、写书人。但出版社的挂历从不刻意强调这点，含蓄、低调、文雅，心照不宣。

书房挂历我总是挂在书橱旁。一般挂日期数字大些的，以便一抬头就看得“1清2楚”。老了，不比当年在乡下当五好民兵连长，那时再小的准星都能瞄准百米开外的靶心圆点。此刻我又习惯性地抬头看了看，因没有新的，旧的还姑且挂在那里。我忽然心想，今年和去年的日期没准碰在一起！果真如此，沿用就是。差一天不好办，差一年没关系，2016权当2017可也。于是拿日记本上前比照：去年元旦星期五，今年元旦星期日，差了两天！非得！

或许你说——实际也有人说不行

了！何苦非看挂历不可？手机上的日历我自然看过，但手机上的日历和书桌前的挂历不是一回事。手机上的日历仅仅是日期，而书桌前的挂历不仅仅是日期，还有别的什么，比如仅我一个人明白的秘密暗号，以及明确标注的“温馨提示”，以及某种幽思……

是的，某种幽思……  
无需说，挂历多是月历。以前是没有挂历的，至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生活中是没有的。那年头用的是日历，中学生巴掌大小，365页厚墩墩订在一起，周日、节日为红色，平日为黑色，固定在彩色硬纸板做的日历牌上。乡下人叫阳历年。一月一日叫阳历年，不叫新年，元旦就更不叫了。阳历年在乡下是没人当年过的，一如平时。因此挂阳历年牌是唯一的新年“庆典”。

我们家住的草房冷得瑟瑟发抖似的蜷缩在山脊里。父亲在离家几十里外的公社(乡)工作，新年也很少回家。阳历年牌就由母亲挂在门房或紧挨炕沿的地柜上端。这么着，糊着旧报纸的烟熏火燎的土屋里，只有阳历年牌是新的，颇有蓬荜生辉之感，我们贫苦的日子因此有了小小的亮点，有了小小的欢欣。日历自然每天撕一页。那也是日夜操劳的母亲一天当中唯一的“文化”活动。有时一边撕一边小声念叨腊七腊八冻掉下巴，或者打春别欢喜，还有四十冷天气……我和弟妹们都还小，最愿意听的就是还有几天过新年、过大年。有时候母亲还端起煤油灯举到阳历年牌前细看，神情似乎分外凄苦，时而发出低微的叹息……

后来长大些了，我猜想那可能是母亲确认父亲回家的时间。没有电话，也没见父亲给母亲写过信。父亲大体每月回家一次，但日期不固定。“文革”期间有时两

三个月都不回来一次。父亲不回来，钱就不回来，家中的日子就更难过了，有时买油钱都没有。加上正是动荡的年月，父亲随时可能遇上什么，母亲难免牵肠挂肚。日子，日历，日历的一天就是一个日子。而对于母亲，则可能是两个日子——这边家里的日子，那边父亲的日子。日历撕下一张容易，但日子熬过一个绝非易事，何况两个！

若干年后我离家进城上了大学，大学毕业后我又离开省城远走高飞去了广州。父亲来信说，家里的母亲总是想我，总是计算我探亲的日子，时常边撕日历边念叨我的小名，甚至险些哭坏了眼睛。而我那时每隔三年才回去探亲一次。可以想见，母亲要翻一千多次日历，要撕一千多张日历才能等来母子相见的日子。多么漫长的等待啊！对母亲来说，日历、阳历年牌是她和儿子之间唯一可以确认、可以触摸的媒介！套用余光中的诗句，亲情像一张日历，母亲在这头，我在那头……

由于这个缘故，多年来我的书房总有一本当年那种老式日历挂在门旁书橱的一端。现在这本是2014年的，也是因为未能及时买到新的，就一直挂在那里——我不是用来看日期，同日期无关。

挂历固然不同于一天撕一页的日历，一个月才撕一张。但撕这一行为和感觉同日历没有太大区别。此外还有一点，那就是我选择的挂历风格大多同过去的阳历年牌两相仿佛，因了那缕幽思……

而这，是手机上的日历功能所无法替代的。世界上总有无法被替代的什么，对于我，就是挂历的感觉、挂历所附带的幽思。那是之于我一个人的挂历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、著名翻译家)

【文化杂谈】

# 桃花源里谁耕田？

□安立志

毛泽东有诗曰：“陶令不知何处去，桃花源里可耕田？”这句诗透露了两个意思：不确定的是陶渊明的去向，确定的是桃花源的所在。然而，近来，桃花源的所在也不确定了。据报道，重庆酉阳与湖南桃源正为“桃花源到底在哪里”争得不可开交。

争抢桃花源，是这些年来争抢名人故居、名人旧地连续大片的续集。争抢名人往往也与争抢名地有关，比如名人的原籍、故居乃至躬耕地。前不久，媒体就报道了襄阳、南阳争抢诸葛亮躬耕地的闹剧。争抢桃花源甚至包括前几年的争抢夜郎国，总比争抢西门庆故居、孙悟空原籍有意义，前者多少有些历史依据，后者完全属于文学虚拟。

桃花源在哪里？有人认为这是《桃花源记》留下的伏笔，因为陶潜并未明确指出“桃花源”的地理坐标或者所属乡县，从而为后人的争抢留下口实。其实，陶渊明的描述并非没有时空界限，比如，在时间上，他有“晋太元中”的明示；在空间上，他有“武陵人”的界定。“武陵”(今湖南常德)虽然不等于桃花源，至少指出了桃花源所在的大致区域。其实，有关桃花源所在地的异议并不自今日始。陈寅恪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从“纪实”角度，旁征博引，得出结论：“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(今河南三门峡)，或上洛(今河南洛阳)，不在南方之武陵。”(《陈寅恪集·金明馆丛稿初编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)

对于古圣先贤、佳山胜水的崇敬与钟爱，并非坏事。今天人们争抢的只是桃花源的旅游价值与品牌效应，没有人关注《桃花源记》到底体现了怎样的境界与理想。至少从字面来理解，陶渊明的桃花源还是一个让人向往的宜居环境，那是一个生态环保型、人际友好型的社会。好地方，人们必然趋之若鹜。

苏东坡在《和陶桃花源并引》中就曾指出，幸亏当时的人们没有找到桃花源，假如“武陵太守得而至焉，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。尝意天壤间若此者甚众，不独桃源”(《苏轼诗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)。这充分体现了东坡先生的预见性。想想人们对于黄帝故里、孙武原籍甚至诸葛亮躬耕地的追逐与疯抢，已经到了“争夺之场”“于今为烈”的程度。今日对桃花源之争抢，与陈寅恪的异议殊不相类。这里已经没有了深入的学术研究，在文化搭台、经济唱戏的口号中，在这种文化标的的争抢中，体现了露骨的资源排他主义与利益垄断主义。

然而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，不能仅从自然环境、社交环境来思考。《桃花源记》的描写背景是“秦氏乱天纪，贤者避其世”(《陶渊明集笺注》，中华书局，2003年)。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在《桃源行》中指出，桃花源并非神仙幻境或海市蜃楼，“望夷宫中鹿为马，秦人半死长城下。”人们对于桃花源的向往，反映了对秦代政治暴虐与社会扭曲的不满，反映了人民对于没有暴政与邪恶的社会环境的憧憬。“此来种桃经几春，采花食实枝为薪。儿孙生长与世隔，虽有父子无君臣。”人们自给自足，虽不丰裕，至少没有等级森严，没有官贵民贱。这是一个平等、纯朴的社会。“世上那知古有秦，山中岂料今为晋。闻道长安吹战尘，春风回首一沾巾。”历史上的分合与兴衰循环往复，逃脱了秦始皇的地狱，又沦入司马氏的黑牢，暴虐依然，纷争继续，诚可谓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”“重华一去不复得？天下纷纷经几秦”(《王公文集》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74年)。这是历史规律的循环，还是人类苦难的宿命？或者寄托了一个政治家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向往与希冀？

时下的一些地方官员缺乏为民服务的诚意，片面谋求局部利益，他们争抢桃花源，即使争抢到手又能如何？即使建起一批桃花源式的仿古建筑又能怎样？这样一种施政理念，又怎能保证不污染桃花源，毁灭桃花源？

1964年岁首，郭沫若在“诸葛草庐”碑文中涉及了官员的政绩问题。他指出：“诸葛隐居隆中时，躬耕自食，足与陶渊明先生媲美。然陶令隐逸终身，而武侯则以功业自见。盖时会使然。苟陶令际遇风云，未必不能使桃花源实现于世。如武侯终身隐逸，致力于诗，谅亦不逊于陶令也。”陶渊明与诸葛亮的确实不似一些官员热衷于钻营官场、游弋宦海，他们二人都有或长或短的隐居经历。然而，诸葛亮志在鼎立三分、逐鹿中原；陶渊明意在隐居田园、采菊东篱。郭沫若只看到二人的隐逸经历，却将二者的政绩简单归为“时会”不同所致。不过，这很不合于一些官员的脾气，他们没有孔明建功立业的本事，没有陶潜耕稼田园的心态，而是“有条件要上，没条件也要上”，他们要上的并非“桃花源”能否“实现于世”，而是挖空心思地谋求提拔与升职。

不过，酉阳与桃源的宣传口号并非一无可取，“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，一个在酉阳(桃源)，一个在你心中。”的确，现实世界是否存在桃花源，桃花源到底在哪里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把桃花源作为一种理想、一种境界，铭记在执政者的心目中，贯彻于执政者的施政中。

(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)

出品：副刊编辑中心  
设计：壹纸工作室  
本版编辑：孔昕  
美编：马晓迪